

#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 危机与变革的再思考

熊跃根

---

**内容提要** 福利国家危机与变革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并诠释福利国家危机论,如何看待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内在性与弹性,学者们远未达成共识。本文从理论和经验资料两方面试图阐释福利国家危机论及其局限性,分析和认识了近20年来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变革和弹性。作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了福利国家危机论的形成,研究者还需要时间和更为充分的经验资料来证明上述危机的原因以及各种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受意识形态主导和依赖片面的经济学的假设来判定福利国家的危机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 福利国家 危机和变革 弹性 全球化

---

## 问题的提出

1989年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最早在其论文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福利世界的三种分类(Esping-Andersen, 1989)。时隔一年后,艾斯平-安德森又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利用既有的统计数据对欧美福利体制进行了分类,根据福利分配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sup>①</sup>程度和公私部门对公民福利的责任承担比例,将这些体制的主要类型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福利体制、以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法团主义福利体制和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福利体制。

本文着重讨论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从理论和经验资料两方面来阐释福利国家危机论及其存在的局限性;第二,深入分析和认识近20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变革与弹性(Resilience, 也可译为“抗逆力”)问题。

在本文,笔者分析的西方福利国家主要是采用了艾

斯平-安德森的分类,从三种不同的福利体制类型中分别选取了四个国家,并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库中的核心指标,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开支投入、失业与就业情况以及其他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静态指标,来分析有关福利国家危机命题和福利国家引发道德危机命题的不足。同时,笔者还将利用四个主要的福利国家代表(瑞典、德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研究文献和数据,来重点讨论近20年来不同类型福利国家的变革和恢复力的问题。

##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 福利国家危机论及其局限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一直面临左右两派政党不同程度的支持与批评,对不同的政治阵营甚至公众而言,福利国家成为有关公民道德辩论的核心议题。<sup>②</sup>而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影响加剧,在不同的福利国家里,政府和政党出于不同的考虑,都或多或少

地将“福利改革”作为一种发展经济和变革社会的核心主张。在英美以及其他福利国家里,对右翼政党和保守份子而言,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和道德抨击的对象,“福利国家危机论”一时间尘嚣云上。<sup>③</sup>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福利国家危机论”的讨论是不足够的,一些看法或论点采取了想当然的态度。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结合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体制变革和社会政策推进的最新经验,来重新认识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福利体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将福利国家的经济现象和福利国家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简单化处理,并忽视福利国家的政策理论与实践经验具有的参考意义。

#### 1.“福利国家危机论”中的自由主义论述及其内在逻辑

在西方学术界,“左派”和“右派”都使用“危机”一词来描绘和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他们主要是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危机的含义,即危机持续不断的问题恶化后出现的一个转折点、危机是一种包括战争、国际经济问题和石油危机等的外部动荡,以及危机是一种难以调和的、长期存在的矛盾(Pierson, 2006)。<sup>④</sup>但是,从捍卫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至上的角度强调或突出“福利国家危机论”,从意识形态和政策上不断对福利国家进行饱和攻击的主要是以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新右派)阵营的思想家或理论家。新自由主义思潮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个人的神圣性置于崇高的地位,他们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主要是,认为福利国家强制性地开征相关税收,政府提供给公民过多的、慷慨的社会福利津贴和服务不仅影响了政府的能力和资源配置资源的效率,还极大伤害了公民的选择自由和能动性,福利最终助长懒惰和不负责任地依赖国家救助,导致社会的道德衰败。他们提出,福利国家是造成财政困难、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因此,改革福利国家,根除福利病和拯救资本主义的重要策略就是向福利开战、削减福利计划、强调公民责任和劳动参与的重要性,将福利与工作紧密联系起来。<sup>⑤</sup>

从新自由主义角度来论述福利国家危机的论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认为福利国家再分配没有效率,不能保证实现平等与公平等社会目标,另一方面认为福利国家以高税收为基础,它产生了抑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要素,由此提高了社会抚养比。与这些论点相关的批评则是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论述福利国家的危害不仅在于破坏了人应该自食其力和通过工作来换取生活的基本品德,更在于它助长了不劳而获与搭便车的恶劣行为,这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是不可接受的。在上述以新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危机论”的观点中,一些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和政党人物(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观点起到了突出作用。在英国,虽然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理论等比较少涉及到社会福利,但他主张的“自由”概念、强调小政府和提倡发挥市场作用的理念影响新右派福利改革的思想。而在美国,弗里德曼是一位坚定的反对政府干预和力主市场自由的卫道士。弗里德曼主张应从公民的个人自由出发,反对家长主义的国家干预,他认为政府的权力集中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故此,弗里德曼认为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有限度,同时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弗里德曼认为英国、瑞典所代表的福利国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无所不包的、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浪费的。弗里德曼主张用实行“负所得税”的方式来替代所有的社会福利津贴项目。<sup>⑥</sup>弗里德曼对国家或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极其反感,他认为这是家长主义限制个人自由最无知的表现,在他所划定的政府智能范围的清单里,只有公共住宅和国家公园算是公共福利或社会福利的内容,显然这是狭隘的。弗里德曼认为通过国家实施的收入再分配来解决收入不均等不仅缺乏道德理由,也缺乏实际的效果,在他看来采用赋税来影响收入分配不管出自何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收入不均等是来自于市场的不完全性,而这本身也是政府的缺陷造成的。显而易见,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里有根深蒂固的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即对政府的不信任、反对政府干预以及相信民间力量的社会功能。一个国家或社会里,政府如何对待穷人、如何采取措施解决贫困问题,从根本上反映了政府的责任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新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自由对公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反对政府干预和限制政府的权力成为保护公民自由的合法理由。针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一个解决途径,而在许多方面还是最理想的途径便是私人慈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的全盛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十九世纪和晚期,我们能看到私人慈善机构和组织的急剧增加。政府福利活动扩展的主要代价之一便是私人慈善活动的相应下降”。<sup>⑦</sup>

在过去针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时,人们往往会将最慷慨和最富有的福利国家—瑞典福利国家作为诘难的靶子。然而,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视为最具科学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他们开展的有关福利国家的研究和结论里也存在明显的漏洞和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外部竞争的增强等因素

的影响,瑞典福利国家曾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为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抨击“瑞典模式”和福利国家的政策。在这些批评中,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委员阿萨·林德贝克的声​​音无疑影响甚至主导了这种观点。这位在瑞典经济学界乃至西方经济学界都有着广泛影响的学者曾撰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瑞典福利国家的扩张和瑞典模式的出现,与其他经合组织发达国家相比,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被甩在了后面(滞后说),同时经济增长率在20多年里一直处于下降趋势。<sup>⑧</sup>针对林德贝克的“滞后说”的研究结论,瑞典著名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领域的研究学者沃特·科比指出,林德贝克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林德贝克所采用了不同时期的统计数据来说明瑞典经济增长的趋势问题,他忽视了瑞典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增长数据所呈现的总体趋势,而只分析了1973—1992的经济增长数据并以此来说明瑞典经济增长的“滞后说”。实际的情形是,瑞典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率都低于经合组织国家,而不是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出现后开始低于上述国家。因此,科比提出,经济学家在从事有关基于经验证据的政策研究时常存在资料客观性不足的问题,而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瑞典。他指出,就当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尽管经验研究中获得可靠数据仍然比较困难,但是人们并未发现明确无误的证据证实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科比在文中指出,在与政策相关的研究领域,经济学家毫无疑问应该遵循一贯的客观和科学的传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并推动学术的进步。<sup>⑨</sup>

如果我们对福利国家危机论的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历史分析,我们将清楚地了解到新右派所反对的政府干预主义经济与社会政策是出自于对国家所有制和集体主义的恐惧与错误诠释,在20世纪上半叶最初的30多年里,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都先后采取和实施了集体主义的社会干预措施,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而这与当时走在世界前列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成功社会计划与国家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无关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前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出现了转折,但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完全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将2008年以来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福利国家近期的社会政策改革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再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尤其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金融寡头和私人企业家的贪婪,我

们就有理由质疑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弗里德曼经济学说中的道德立场对人类社会总体利益存在的致命缺陷。在全球化时代,在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福利国家经历了显著的福利改革历程,福利紧缩的政治一方面并未有效地控制政府公共开支的规模,另一方面极端的福利改革措施却使得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而对政府和公民来说,他们最后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仍然是要坚持政府干预和通过改善穷人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处境来缓解社会矛盾,仍然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实施更为积极的社会政策改革来刺激经济发展和稳定大众的社会心理<sup>⑩</sup>。因此,全球化尽管给福利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并对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有某种显著影响,但人们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认为,全球化促使了福利国家改革走向了一种趋同的后果,即福利紧缩在福利国家中普遍出现了。实际上,通过学者们的经验研究和现有的数据表明,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文森特·纳瓦罗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时期的20年(1980—2000)中,大多数OECD国家的社会公共开支和公共就业这两项重要指标都一直保持了增长,他们提出这一现象实际上是与福利国家一贯的政治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sup>⑪</sup>可见,新自由主义一贯的“福利国家危机论”,其论述逻辑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也没有超脱出旧有意识形态的思维,他们否定了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和集体主义观念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重要性。因此,如果研究者仍然固守某些线性的和不加细致分析的结论,我们就很难对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发展进行有效分析。

## 2.“福利国家危机论”的局限性

20世纪70年代西方石油危机以来,起因于经济增长减速的“福利国家危机”问题,开始逐步进入社会科学界并成为近20年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艾斯平—安德森1990年针对福利国家类型学的研究成果的出版,又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福利国家变化、改革和真实的动态情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细致的研究的热情。最近十几年研究者对福利国家发展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分析,既超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寻找部分有利证据来论述福利国家危机问题,也不同于传统左派学者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出发对危机问题进行的理论阐述。福利国家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保罗·皮尔逊指出,从20世纪70年到90年代末的20多年间,社会科学家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主要包含了三类: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性别和社会政策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福利国家长期过程的

研究, 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福利国家的原因和后果。同时, 他也明确提出, 对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供给的政治学分析将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sup>⑫</sup>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危机论”, 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些观点的局限性, 同时阐明福利国家动态变化的一面, 以避免对福利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过于简单化地理解。

从本质上讲, 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提出的“福利国家危机论”主要是在两个层面展开的, 一方面是从社会福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批评, 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过大会影响经济增长, 对经济成长造成损害, 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福利与个人行为及道德品质的关系提出质疑和批评, 认为国家为公民提供过多的、慷慨的社会福利会削弱公民的自立行为和工作动机, 从而造就福利懒汉与福利依赖, 进而败坏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平。然而, 从过去长达 60 多年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 研究者实际上很难从福利国家产生的经济和道德后果两个方面对福利国家做出一个一致的和没有疑义结论, 原因是目前的福利国家状况虽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相似性, 但是由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政党政治、社会结构和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存在的差异性, 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影响和后果。首先, “福利国家危机论”一种主要的论点也是新自由主义者坚持的, 即认为福利国家或社会福利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但是, 社会科学家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 明确指出这一结论是有争议的, 也是不确定的。目前就福利国家与经济发展二者内在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经济学家们获得了正负两方面的证据。其次, 一派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对社会福利的观点被称为“侍女模式”, 即把社会福利看作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补充, 认为社会政策的作用是通过服务劳动者、提供产业服务和为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在英国乃至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一度统治了理论界并影响了政府的干预政策。这位活跃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西方政治经济舞台, 但迄今仍然被看重的经济学家具有将福利支出看作是一种有效的经济调控(即创造有效需求), 从而在经济衰退时平衡经济(德国是典型的例子)。新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看作是经济绩效的负担, 公共开支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束缚。实际上, 经济学家从上述两方面的经验中都找到了众多的相互矛盾的证据, 即在社会福利支出规模比较高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高过支出规模较少的发达国家, 同时从经验数据中研究者迄今也未发现一种前后一致的模式, 证实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特定的关

联。让我们先来看看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的变化情况。



图 1 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 1980—2005 年间

公共社会开支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 根据 OECD 统计数据库整理获得。

图 1 清晰地呈现了在 1980—2005 年期间, 四个代表性的福利国家的公共社会开支比例变化的情况。作为社会开支最高水平的瑞典尽管在 1990 年后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其他三个福利国家, 但它在 2000 年之后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而社会开支水平处于福利国家中间位置的德国, 长期以来也一直保持了稳定并在 1990 后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 其公共社会开支水平一直明显高于盎格鲁—撒克逊福利国家社会开支的水平。英国和美国的公共社会开支水平在 1990 年后总的趋势是上升的, 相对而言美国是缓慢的上升, 同时在 1995 年之前, 它的公共社会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低于 15%。在四个福利国家中, 瑞典和德国一直高于 20%, 其中瑞典在 1990—1995 年期间一度超过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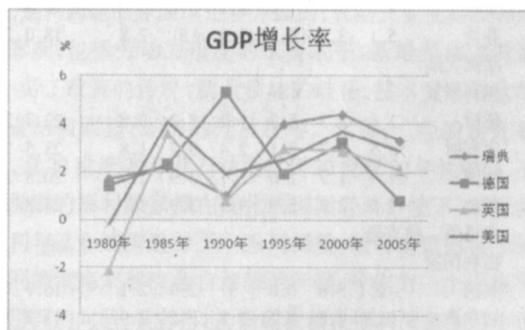


图 2 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 1980—2005 年间

1980 年至 2005 年间 GDP 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 根据 OECD 统计数据库整理获得。

而从福利国家在 1980—2005 年经济增长的情况(如图 2 所示), 我们看到各国的经济表现也不尽一致。德国在 1990 年后经济增长中间有回升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其 2005 年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低于 1980 年的水平。瑞典在经历 1990—1993 年期间的经济衰退后, 迅速出现增长

势头并一直保持到 2000 年后, 2005 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 1990 年的水平而英国和美国 1990 年后经济增长总体是上升的趋势, 但 2000 年后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 60 年来, 福利国家的目标一直是力图将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的目标结合。实际的情形是, 不同的福利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遭遇了经济危机或衰退带来的影响, 并在 80 年代后开始不同程度地从立法和政策改革的层面上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改革, 各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水平的增长速度在之后开始放缓了。研究者指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主要福利国家尽管都遇到了平衡预算的困难, 公共社会开支水平仍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因此, 就社会福利或福利国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规模促进了或延缓了经济增长。<sup>⑬</sup>

从上面的图 1 和图 2 中, 通过分析和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率与各国的公共社会开支规模并非是一致的, 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的变化趋势也比较复杂, 并没有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内在性, 唯一的一致性趋势是四

个福利国家经济增长在 2000 年后增长势头都减弱了, 经济增长率下降了。而从表一中 12 个福利国家的相关数据中, 我们却清楚地看到, 三种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水平仍然保持了艾斯平—安德森(1990)曾论述的基本特征, 即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开支水平最高、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其次、盎格鲁—撒克逊福利国家最低。与此同时, 过去 20 多年福利国家社会开支水平的某种刚性特征, 也表明在现实中“福利紧缩”政治过程的复杂性, 这些经验证据也再次支持了保罗·皮尔逊等学者 20 世纪 90 年代及之后的经验研究, 他们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包括英美和其他西欧国家)出现的福利紧缩现象, 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财政危机下政治变革的产物, 也是政党实施福利改革的机会。但是, 这些福利紧缩的改革也只是局部的政策调整, 福利国家并没有出现结构性的显著变化, 皮尔逊等学者认为政策上的路径依赖和制度结构限制了这种激进变化的可能, 同时也表明了传统政治实践的某种延续性。<sup>⑭</sup>

表 1 不同福利国家 1980—2005 年间三项主要指标的变化情况

	GDP 年增长率(%)						公共社会开支占 GDP 的比例(%)						长期失业人口的比例 (占总失业人口的%)					
	80	85	90	95	00	05	80	85	90	95	00	05	80	85	90	95	00	05
北欧福利国家																		
瑞典	1.7	2.2	1	4	4.4	3.3	27.1	29.4	30.2	32.1	28.5	29.4	5.5	11.4	12.1	27.8	26.4	—
丹麦	-0.4	4.0	1.5	3.1	3.5	2.4	24.8	23.2	25.1	28.9	25.6	26.9	—	34.4	29.9	27.9	20.0	25.9
挪威	4.5	5.4	1.9	4.2	3.3	2.7	16.9	17.8	22.3	23.3	21.3	21.6	—	10.0	20.4	24.2	5.3	9.5
芬兰	5.1	3.3	0.1	3.9	5	2.8	18.0	22.5	24.2	30.9	24.3	26.1	27	21.1	—	37.6	29.0	23.0
欧洲大陆福利国家																		
德国	1.4	2.3	5.3	1.9	3.2	0.8	22.7	23.2	22.3	26.5	26.2	26.7	—	47.8	46.8	48.7	51.5	54.1
比利时	4.5	1.7	3.1	2.4	3.7	1.8	23.5	26.0	24.9	26.2	25.3	26.4	—	68.9	68.5	62.4	56.3	51.6
法国	1.7	1.7	2.6	2.1	3.9	1.9	20.8	26.0	25.1	28.6	27.9	29.2	35.1	43.7	38.1	42.5	42.6	41.4
荷兰	2.2	2.3	5.3	3.1	3.9	2	24.8	25.3	25.6	23.8	19.8	20.9	—	59.4	49.3	46.8	—	40.1
盎格鲁—撒克逊福利国家																		
英国	-2.1	3.6	0.8	3	2.9	2.1	16.7	19.8	17.0	20.2	19.2	21.3	—	50.3	34.4	43.6	21.1	22.4
加拿大	2.2	4.8	0.2	2.8	5.2	2.9	13.7	17.0	18.1	18.9	16.5	16.6	5.3	12.2	7.2	16.8	11.2	9.6
澳大利亚	3.4	4.4	-0.6	4.1	1.9	3	10.6	12.5	13.6	16.6	17.8	17.1	19.2	30.8	21.1	32.0	25.5	17.7
美国	-0.2	4.1	1.9	2.5	3.7	2.9	13.1	13.1	13.4	15.3	14.5	15.9	4.3	9.5	5.5	9.7	6.0	11.8
OECD	1.3	3.6	3	2.5	4	2.6	16.0	17.7	18.1	19.9	19.3	20.5	12.7	34.1	31.2	34.0	31.4	32.8

资料来源: 根据 OECD 统计数据库整理获得。

表中“—”虚线表示数据缺乏。

除了结合上面呈现的数据资料和过去学者对“福利紧缩”问题的经验研究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另一个显著的例子, 20 世纪 90 年代北欧福利国家中的代表——瑞

典福利国家呈现出的特征来说明“福利国家危机论”中一些观点存在的局限性。1991 年—1993 年期间瑞典经历了明显的经济衰退, 该国两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负

数, 1993年失业率上升到12.5%, 国家公共收入减少, 国家财政陷入严重赤字。由于考虑到选民的压力、降低福利开支的争议性和政党自身的政策立场等多重原因, 在这一段艰难的时期, 瑞典福利国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开支水平, 并未出现预期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预算的政策措施, 政府通过增加税收和降低成本来实现了政策目标。<sup>⑮</sup>无独有偶, 研究同样表明, 在20世纪80—90年代期间, 在几乎所有北欧福利国家陷入经济困境时, 其社会政策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福利紧缩并没有出现。<sup>⑯</sup>瑞典和其他北欧福利国家上述的变革经验说明, 福利国家的政策发展和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它提醒我们警惕一个常规的假设或观点的谬误性, 即在经济衰退的条件下福利国家将会出现福利紧缩或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

对“福利国家的危机”问题的认识, 尤其是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保守的政治家的观点中, 我们看到国家的再分配效率与公民自由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 政治上的立场和保守的政策改革倾向使得一段时期内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的福利国家的政府, 毫无疑问地实施更为严格的社会救助政策和大胆的劳动力刺激计划。然而, 如果我们把福利国家本身当作一个运行良久的社会系统, 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制度很早就已经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如经济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因此认识它的“危机问题”需要研究者从制度结构和体系运作功能的角度再做进一步解释。在针对福利国家危机的分析中, 经济学家们更多的是强调这一制度的效率, 而通常忽视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对公平的影响作用。尽管在许多福利国家里, 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在保守的政治环境和不景气的经济氛围里容易受到选民与政党的攻击, 但是即使是在所得税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里, 公众对福利的态度仍然保持了某种一致性, 也使得支持福利国家政策的政治基础有某种连续性, 这就能部分解释为何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高税收和高福利长时间内保持并存的事实。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也表明, 公众对福利国家政策的支持态度与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如推崇平等或均等、注重对脆弱人群的社会保护等)。<sup>⑰</sup>同时, 类似的经验研究也表明, 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里, 公众对福利国家里政府干预行动的支持水平是明显不同的, 这一结果正好吻合了三类福利国家不同社会开支的水平, 即在瑞典等北欧国家里, 公众对福利国家的政府干预行动最支持, 欧洲大陆福利国家其次, 在盎格鲁—撒克逊或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里, 公众对政府干预行动的支持程度最低。<sup>⑱</sup>

在福利国家危机论中,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观点是“福利国家诱发道德危机”, 一些研究者和保守的政治家提出, 福利国家为公民提供的众多慷慨的社会福利津贴项目和社会服务容易引发出一系列道德灾难, 即促使不劳而获的现象不断增加、公民的就业动机下降(或自愿失业增加)、滥用福利、逃避税收和公民责任心下降等, 而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关于福利养懒汉即“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问题。基于此, 在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里, 社会和公众把贫困和失业问题归结为个人的道德缺陷和能动性缺乏, 一时间处于社会边缘的穷人和低下阶层成为主流社会谴责的对象。<sup>⑲</sup>然而, 在福利国家里, 是否是社会福利项目和其他社会计划造成“福利依赖”所谓的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 对这一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阐释是澄清“福利国家危机论”中有关道德论述局限的重要出发点。在过去10多年来, 对“福利依赖”问题的讨论和辩驳成为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中一个重要的话题, 它也成为学者讨论福利国家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基础内容。<sup>⑳</sup>福利与失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因为失业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从各主要福利国家长期失业的情况来看, 上面表一的数据呈现的是一种矛盾的现状: 在每一种福利体制中, 在1980—2005年期间, 长期失业比例都呈现出两种趋势, 一些国家这一比例上升了, 另一些则下降了。研究者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说明福利造成了长期失业或长期失业比例高的问题。在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里, 长期失业一直是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 这一问题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 长期失业受到多种原因影响, 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新增劳动力的情况、劳工政策的传统、就业领域的歧视、技术变革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的开放性等。实际上, 经验研究表明, 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都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下, 对社会福利与就业结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政府都试图在寻找不同的策略来解决各自面临的问题。<sup>㉑</sup>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层面的问题, 学者指出, 福利依赖在福利国家体系中通过转移支付的救助支出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有需要的公民从国家福利体系中得到满足是一种公民权, 它不再同于早期贫困人士对私人救助或慈善的依赖。<sup>㉒</sup>而新右派批评家和保守的政治家提出, 福利依赖本质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公民的自由, 他们提出应该通过更为有效的工作刺激计划来减少贫困人士对政府福利计划的依赖。而实际的情形是, 英国和美国政府通过“工作换福利计划”驱使数以万计的低下阶层人士(如单亲母亲)进

入劳动力,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反而陷入更为可悲的社会排斥的境地。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在当今福利国家里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的提升,一方面反映了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已经丧失了以充分就业的基本政策目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失业和福利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因为福利助长人们依赖福利而放弃就业的,从下面表二中的数据可以看到,在过去20年多里主要福利国家的就业率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而从欧盟的数据来看,在1997至2004年期间,随着欧盟设定的2010年发展目标的实施,欧盟国家总体的就业率尽管各国水平存在差距且实际提高的速度不快,但总体就业率仍保持了上升的趋势。<sup>②3</sup>

表2 不同福利国家1980—2005年间就业率(%)的变化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瑞典	79.8	80.2	83.1	72.2	74.2	73.9
德国	65.2	61.6	64.1	64.6	65.6	65.5
英国	---	66.7	72.5	69.7	72.2	72.6
美国	67.2	69	72.2	72.9	74.1	71.5
OECD	64.2	63.4	65.7	64.2	65.6	65.5

资料来源:根据OECD统计数据库整理获得。

表中“---”虚线表示数据缺乏。

通过分析和认识“福利国家危机论”的自由主义及道德批判的论述,我们看到了这些研究和理论阐释中存在的方法论上的漏洞和价值观偏好中对放任主义、市场至上和个人主义价值的推崇。然而,对福利国家理念和政策的批评从而导向福利国家危机论,可能与探究实际上福利国家内部的问题或危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变革和弹性

众所周知,福利国家(尤其是北欧福利国家)传统的理念是根植于社会权、普惠性和团结的原则。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改革逐渐动摇了上述政策理念,福利改革的一个显著后果是公民的社会权越来越与个人责任和选择性原则联系在一起。<sup>②4</sup>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它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产生了进一步的显著影响,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制度的影响也日益加深。针对全球化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福利国家的潜在影响及改革趋向,学者深入地分析了内外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对上述趋势的影响,从理论上对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做出了合理的解释。<sup>②5</sup>也有学者也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社会政策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在新的时期政府从社会保障领域进行变革

的紧迫性。<sup>②6</sup>还有学者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对社会保障机制与福利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阐释,提出了除了一般的社会正义的目标原则外,经济效率的考虑也是促成福利国家分配机制与模式的重要内因,从而分析了福利国家存在的理性缘由。<sup>②7</sup>对西方福利国家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影响作用是其给政府的再分配活动造成了某种紧缩效应,同时它也要求各国国家对其社会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sup>②8</sup>然而,作为外部的研究者,我们仍需要注意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既不是采取了等同的模式,在政策实践上也并非铁板一块。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弗瑞·萨克斯曾撰文明确指出,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最大的挑战来说,是如何将经济繁荣与社会保障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而要验证究竟是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好,还是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福利国家体制好,应该从证据中来得出结论。从贫困率、工作人口的年平均收入、财政赢余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国家的研发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多项指标来看,后者都要比前者好。基于这些证据和理论分析,萨克斯指出,哈耶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北欧福利国家这些拥有强有力和活跃的民主制度的地区,慷慨的社会福利国家并没有引向“奴役之路”。相反,它带来的是公平、经济平等和国际竞争力。<sup>②9</sup>

#### 1.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变革

在学术界,全球化被看作是福利国家社会政策改革的一种动力或外部因素。<sup>③0</sup>也有学者提出,福利国家变革的更为重要的动力或原因来自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回应民族国家内部自身的政治经济要求,是社会政策变革的主要原因所在。<sup>③1</sup>同时,学者们经过对1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研究指出,1975—2001年期间经济全球化对不同的福利国家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但并不存在系统的差异,全球化尚未作为一种影响力量造成福利国家的扩张、危机、缩减和趋同,实际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更明显。<sup>③2</sup>无论如何,全球化因素已经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改革产生了影响,在21世纪福利国家的福利提供方式、特性和质量都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影响,并反映在民族国家不同的社会政策变革实践中。<sup>③3</sup>

在全球化时代里,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性以及后工业经济模式都对福利国家公民的社会权、就业和自由等产生了诸多影响。在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里,福利改革的举措尽管不同,但都是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在欧洲还包括区域一体化)的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应对

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需求。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全民主福利体制一贯享有的声誉表现在其慷慨的福利、可观的经济增长、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以及性别平等,其目标是将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紧密结合起来。尽管北欧几个主要的福利国家在社会政策上也存在差异,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它们都先后开始了社会政策改革。以瑞典为例,近年来其经济和社会政策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增强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其特有的社会福利模式,针对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包括人口老化、福利津贴项目的滥用、失业等问题,政府采取了以下的变革政策:第一,采取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加大政府对就业培训、技能培训和与就业相关的支持政策,通过社会立法和有效监管极力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来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如在公共部门中倾向于增加或保护女性的就业机会);第二,为应对人口老化,瑞典政府逐步开始实施实现延长退休年龄,以增加就业人口,从而减缓退休金缴费的压力;第三,通过改变过去被动的、基于公民需要的收入维持计划,来刺激公民的就业和家庭事物的合理安排,政府通过改善儿童照顾服务来不断提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进而减少两性在收入与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第四,在退休近、医疗服务和其他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逐步扩大私营部门或非营利部门的参与,促进公共部门社会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提升,从而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财政资源方面的浪费。而在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福利国家里,两国的福利改革政策尽管有不同,但却保持了高度的相似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们各自都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社会救助政策,美国在1996年结束了长达60多年的贫困救助计划,代替它的是针对贫困人群的暂时的救助计划,而英国工党政府也在2007年颁布了最新的福利改革法案,两国都大力推行了“工作换福利”(workfare)的计划,从而刺激穷人通过就业来摆脱政府救助。尽管贫困救助改革和“工作换福利”计划遭受了广泛的批评,但是这些变革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其他一些福利国家所仿效。在欧洲大陆,保守的或法团主义的福利国家的改革尽管各自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共同面对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刺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性和提升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福利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福利制度带来的压力。在荷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实施的弹性的就业政策和积极的劳动力政策,获得了广泛的好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荷兰政府把创造就业岗位、刺激劳动力市场中就

业的灵活性和选择、改变非工作性的福利分配措施以及增强在社会政策协商和决策中的行动者互惠关系模式(政党、工会和工人都互相倾听对方的声音)作为政策改革中的核心要点来实施,在国家、工会与就业者之间实现新的协议,促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sup>④</sup>在德国,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政府的社会开支支出明显增加了,其福利国家中福利项目在支出水平上虽有微小幅度下调,但其结构几乎未发生大的变化。对德国政府而言,改革的最重要影响来自于政党竞争、工会、选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压力,过去一段时间直至最近几年,德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一方面是通过改革来减少失业津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法案,刺激劳动力就业。对德国政府而言,如何在福利改革中尽量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协调好家庭照顾与就业市场关系、改善长期失业状况和推动经济增长仍是政府社会政策中的重点考虑。

## 2. 全球化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弹性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在欧洲还包括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虽然不同福利国家在某一段时期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紧缩,但经验证据表明,它们仍然在规模和结构上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在后工业经济时代里遭遇了财政赤字、福利津贴削减和救助标准严格等紧缩变化。然而,由于各福利国家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福利改革措施,通过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私营化、混合经济以及重新定位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以及福利国家形成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党制度等,又限制了福利国家任何激进的改革措施或逆福利方向的改革政策具有的效力。过去的经验表明,福利国家的改革很难打破既有的制度和结构平衡,因为政府在不同时期必须考虑到政策变革可能导致的政治与社会风险。以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为例,研究者提出,福利国家的制度建设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体制合法性,尤其是从意识形态上说,公民对国家收入再分配、社会公正、平等和普遍的公民权利的期望,促成了福利体制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的实现。在北欧福利国家经历20世纪90年代短暂的衰退后,其发展趋势迅速回升。而且危机之后,在北欧福利国家里,公众对公共福利和政府责任仍抱较高的期望。<sup>⑤</sup>作为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过去10多年所经历的社会政策变革和发展,充分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取向给它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也显示出即使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的背景下,福利国家仍然保持了某种

制度上的弹性,这使得研究者们要认真反思和检验有关“福利国家紧缩”的议题。<sup>③</sup>学者也提出,即使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瑞典福利国家在特质上仍然保持了它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抗逆力,其福利模式由于在理念上有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存在的两性平等的制度安排,虽然强调劳动力参与的福利改革措施得以推行,这些措施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比较脆弱的人群产生了一定压力,但它们依旧没有改变福利国家的固有惯性和结构特征,这是为何瑞典福利国家制度持续生存的一个重要谜底。<sup>④</sup>

所有针对福利国家危机和制度延续性的讨论,都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福利国家制度何以生存?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的“福利国家危机论”虽然让人们看到经济衰退、人口结构变化和政党竞争导致的变迁等导致的福利改革及其影响,但是,它仍然没有足够重视和更为深入地分析福利国家改革新政策产生的效果(如通过降低失业津贴替代率、减少享受病假津贴时限、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就业政策刺激就业水平和经济增长)和福利体制自身具有的内在性,这正是本文将福利国家的弹性或抗逆力作为研究问题的主要出发点。研究者基于商品化/去商品化、家庭化/去家庭化以及选择型和普惠型等基本原则,将福利国家分成了三种主要体制,并成为讨论福利国家变化和改革后果的基础,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在这些众多的福利国家中,不同福利体制之间存在的广泛差异和各自具有的特性。“危机”一词有时就象福利体制类型的名字一样,具有某种偏差或误导性,研究者对福利国家背后的制度及其结构进行深入的探究,才可能真正理解福利国家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和政策逻辑。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这场危机目前还未宣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自身的结束,危机之后主要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府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来解决危机导致的各种问题,以协调市场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现实证明,一个过度强调市场力量和功效而忽视国家调节或干预作用、一个只顾少数人利益而忽视广大公民基本需要和一个将自由置于正义之上的制度上是存在问题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和认识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也促使人们有机会认真反思新自由经济范式存在的致命缺陷。<sup>⑤</sup>

## 结论与讨论

在论文中,笔者基于相关核心文献和对有关统计数

据的分析,阐释了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福利国家危机论的局限性以及福利国家的变革和弹性的问题,并结合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与政府重点实施民生工程的社会政策实践,对未来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方向、模式选择和社会政策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论述。

经过研究,笔者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福利国家危机论”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些“危机论”尽管从现象上说明了福利国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其自身仍然无法从经验证据和理论上充分证明“危机”的实质原因和各种要素的内在关联性,而将福利国家与经济衰退、社会福利与公民自立动机下降而出现普遍依赖、福利与公民品德失败等直接关联起来目前还无法证实其有效性。实际上,福利国家危机论本身是一个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而福利国家的基本现状和规模也显示,长期以来福利国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紧缩。同时,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在诸多社会—经济指标上呈现出了相同或相反的矛盾情形,也很难证实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福利国家走向了趋同。因此,在对“福利国家危机论”进行理论分析时,作为研究者应避免将分析和结论建立在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判断之基础上,或依赖片面的经济学上的假设和有失偏颇的推理来证明福利国家的经济和道德后果。笔者指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需要未来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探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全球化时代的进程,西方福利国家经济发展面临了诸多挑战,倡导建立“福利社会”,推动多元福利的发展,实现国家(或政府)、市场与家庭在福利承担责任上的新的社会契约关系,成为福利国家改革时期政党政治的基本共识。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是,在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里,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里进行了不同的变革,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总体来看,各福利国家都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政策进行了调整,为维持福利国家所依赖的税收基础,刺激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福利的结构成为福利国家的政策优先性考虑。因此,几乎所有福利国家都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政策,将福利权与公民责任挂钩,严格实施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救助和相关社会服务进而减少滥用福利,通过鼓励或激励机制刺激私营部门或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提供者角色以及通过增加社会保险机制中的公私混合机制来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基础等。上述变革措施和福利国家自身的内在性,形成了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弹性(或抗逆力)特性,制度变革和政

策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制度在功能上的一些缺陷。近年来,福利国家的改革一方面要促使经济增长恢复活力,另一方面也冀望实现公民与国家之间新的社会契约模式。然而,在未来这一新的社会契约如何通过福利体制的再造以及如何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实现,仍是一个从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层面上有待观察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30年前,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了福利国家的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替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逐步与社会发展整合在一起。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历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的社会进步,让世界看到一个锐意改革和不断追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巨大变化。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持续积累的国家财政实力和集中政策实施能力以及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世界对中国的成就刮目相看。尤其是在最近两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的经济衰退和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治理的缺陷。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国家的社会制度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未必是单一的,改革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不同的经验和模式。相反,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引发的诸多灾难中,人们开始相信集中化的政府和强有力的执政党在解决经济难题、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们仍有必要对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和深入的分析,并从中找到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and 吸取教训。从理论上说,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制度设置,在过去6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如较高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水平、先进的教育制度和较高的公民受教育水平、较完备的儿童福利、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民社会安全网的广泛覆盖等)。然而,福利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的内在缺陷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社会福利体制也出现了一系列困境和难题,而从制度变革和政策完善的角度出发,认真分析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策略和社会政策实践的经验,对我国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无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转型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科尔奈教授在其著作《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曾鲜明指出,同资本主义相比,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体制保持了某种混合的优势,它一方面可能成

为冲突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促进公民团结、正义和理性力量回归的思想动力。如果要保持这种改革后的体制具有某种持续的生命力,政府内部的决策者必须认识到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必须深刻认识到旧的体制及其观念对社会主义体制深入发展带来的阻碍。<sup>⑨</sup>

- ①“去商品化”是G.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使用的核心概念,它是和“商品化”概念对应的。在书中,艾斯平—安德森将“去商品化”定义为在福利国家里公民获得福利服务和津贴项目并不是基于公民出卖劳动力(就业)的条件,而是基于其公民资格,这种福利权利不与就业关联的程度就是“去商品化”,它表明了国家或政府对公民的照顾责任及其范围。
- ②Pierson, C. 2006.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③Murray, C. 1982. “The two wars against poverty”, *The Public Interest*, 69, 4—16; Mead L. M. 1991. *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3—20.
- ④Pierson, C. 2006.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Cambridge: The Polity Press.
- ⑤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 New York: Basic Books; Piven, F. F. & Cloward, R. 1993. *Regulating the Poor*. New York: Vintage; Mead, L. (ed.), 1997. *The New Paternalism*.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 ⑥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8—30页。
- ⑦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与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3页。
- ⑧Lindbeck, A. 1997. “The Swedish experi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 September, 1273—1319.
- ⑨Korpi, W. 2000. “Welfare states, economic growth, and scholarly objectivity”, *Challenge*, 43(2), March/April, 49—66.
- ⑩Pierson, P. 1995. *Dismantling the Welfare State? Reagan, Thatcher and the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⑪Navarro, V. et al., 2004. “Is globalization undermining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133—152.
- ⑫Pierson, P. 2000.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3, Issue 6/7, 791—821.
- ⑬Alber, J. 1988. “Is there a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from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81—205.
- ⑭Pierson, P. 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welfare state”, *World Politics*, 48, January, 143—79; Scarborough, E. 2004. “West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The old politics of retrenchment”, *European Jour-*

- 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8, No. 2.
- ⑮Lindbom A. 2001. "Dismantling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model? Has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lost i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Vol. 24, No. 3, 171—93.
- ⑯Nordlund A. 2000. "Social policy in harsh times: Social security development in Denmark, Finland, Norway and Sweden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Vol. 9, Issue 1.
- ⑰Blekesaune M. and Quadagno, J. 2003.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state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4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No. 5 415—427.
- ⑱Andr , H. J. and Hein, T. 2003. "Four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9, No. 5, 337—356.
- ⑲Goodin, R.E. 1988. *Reasons for Welfar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midtz D. and Goodin, R. E. 1998. *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⑳Fraser, N. & Gordon, L. 1994. "'Dependency' demystified: Inscriptions of power in a keyword of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Politics, Spring*.
- ㉑Scharpf, F. W. and Schmidt, V. A. 2000. "Introduction", F. W. Scharpf and V. A. Schmidt (eds.), *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 Volume II. Diverse Responses to Common Challe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㉒Goodin, R.E. 1988. *Reasons for Welfar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78—181.
- ㉓Watts, B. 2006. "Chapter 8 Employment and welfare reform in the EU", *Beyond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London: Open Europe.
- ㉔Cox, R. H. 1998. "The consequences of welfare reform: How conceptions of social rights are changing",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7, 1, pp. 1—26.
- ㉕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 ㉖关信平:《全球经济竞争与社会政策发展——兼析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社会政策面临的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㉗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㉘Sapir, A. 2006.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s", *JCMS*, Vol. 44, No. 2, pp. 369—90.
- ㉙Sachs, J. D. 2006. "The social welfare state beyond ide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Magazine*, November.
- ㉚Yeates, N. 2001.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Sage.
- ㉛Navarro, V., Schmitt, J. & Astudillo, J. 2004. "Is globalisation undermining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8, 133—152.
- ㉜Brady, D., Beckfield, J. Seeleib—Kaiser, M. 2005.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1975—200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0, December, 921—948.
- ㉝Gonzales, V. 2008.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s of social welfare: An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and emerg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Inquiry*, Vol. 1, No. 2 155—179.
- ㉞荷 耶勒·费舍、安东·黑姆耶克:《荷兰的奇迹: 荷兰的就业增加、福利改革法团主义》,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2008年,第175—181页。
- ㉟林卡:《北欧国家福利改革: 政策实施成效及制度背景的制约》,《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
- ㊱Clayton, R. and Pontusson, J. 1998. "Welfare—state retrenchment revisited. Entitlement cuts, public sector restructuring, and inequalitarian trend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World Politics*, 4.
- ㊲Lindbom, A. and Rothstein, B. 2004. "The mysterious survival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Association September 2nd—5th, 2004 in Chicago. *Panel 14—3 The Survival of the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 Model*; Korpi, W. 2003. "Welfare—state regress in western Europe: Politics, institutions, globalizations, and European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589—609.
- ㊳Collignon, S. 2009. "The dawn of a new era: Social democrac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Policy, Social Democracy*, Vol. 4, No. 1.
- ㊴匈牙利 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第538—539页。

作者简介:熊跃根,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毕素华]